



社会主义作为一项文明规划： 反思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中的马克思主义

Michael Brie [著] 范 敏 [译]

摘 要：19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与发展激起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浪潮，在此期间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组建了机构，发起了运动和起义。20 世纪新的帝国主义秩序和世界大战引发了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它激发了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新女权主义以及解放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俄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内部的社会改革。如今，深层危机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转型则会带来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与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一样，它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以及改良主义，这些思想不仅为反思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引领了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使它得以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扩展到资本主义矛盾的内部和外部，还创建了新的阶级联盟，并实现了国家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时还试图去支撑一种新的文化。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将会走得更远，它不仅反映和支撑文明的全面转型，还要反映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透射出人与社会、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成就还是社会主义的成就，也无论是民主斗争还是解放斗争，它们都将一起被整合进新的发展道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好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努力下，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向前发展。本文首先概述了在欧洲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中马克思主义的现行元素，再将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相联系，从而展开一场新的对话。

关键词：社会主义浪潮；马克思主义；文明与危机

一、19 世纪：第一次社会主义浪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转型，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根基。这场转变涉及五个彼此推动的事件：(1)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它是以机器和工场为基础的；(2)北美和法国的政治革命带来了新的国家政治秩序，它是以明确人权和公民权为基础的；(3)反殖民主义运动，特别是海地革命和随后的拉丁美洲革命，要求享有无关于种族与肤色的民族自决权；(4)英国开始推行全球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政策；(5)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催生了一种永恒进步的理念，它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盛行。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社会进化的这五个因素，已成为 19 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典型特征^①。它以工业为物质性基础，以资本主义信贷为驱动力，以权力政治为意志力，以全球海

^①Stuart Hall, David Held, Don Hubert, Kenneth Thompson (Hrsg.).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5.

洋军事力量为武器,以批判主义为精神,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新世界^①。这个新社会的主要特质就是:它总能做得更多、占有更多也需求更多;它不仅能够到达全球的每个角落,而且完全以自我利益为基点,它是如此令人着迷而又令人生畏地出现在世界上。新社会就像一辆重型货车,它碾碎了全部旧有的传统社会,甚至最终吞噬了伟大的亚洲文明。这是一场彻底的“世界转型”^②。

从一开始,这场全球资本主义转型就遭遇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抗运动。下层平民、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不断壮大;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鼓舞下,当时爆发了很多起义和革命,从巴贝夫(Babeuf)领导的“平等会”密谋开始直到太平天国起义^③。在此过程中不仅逐次产生了各种革命,还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型进而形成了多种面向改革的方法。这其中就蕴含了一个目标:如何组建工人合作组织和农民自我组织,创立革命组织,提升社会改革的理论方法以及走上民主化道路。从本质上说,这些尝试遵循三条路径:在既定秩序内部创建壁龛结构(填隙式转型)^④,体制的革命性断裂(断裂式转型)以及扩建福利机构(共生式转型)^⑤。

在这种情境中,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激进的智力创新与政治创新,它有机地将各种方法融合进一个新的范式。该范式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潜能和权力结构,它不仅将这种分析与注重社会参与者(特别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自我组织相结合,还将这种分析与自由联合体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相结合,目的是为了将学术方法与实际行动及普世解放这三者融为一体^⑥。

二、20 世纪: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和它尚未解决的矛盾

20 世纪,它是一个见证了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与各种合作举措全面付诸实施的世纪。共产党及其联盟领导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形成了国有政治经济体系和集体所有制以及指令(计划)经济。它使原本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走上了大规模发展的道路。一个独立的世界体系逐步形成。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个体系却比不上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其资源效率 and 创新能力都得不到充分发挥^⑦。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实行了改革开放^⑧,而苏联和东欧也向市场经济转轨,由此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此时,特别是在北欧和西欧,社会民主的第三条道路取得了重大的社会进步,显著降低了社会不平等。但虽然如此,要将这种成功转换为一种更为广泛的经济民主却显得无能为力。因为第三条道路无法从根本上破除资本积累对经济和社会的主宰。新自由主义改革重新恢复了竞争国家对福利国家的主宰。各种集体社区规划遍布各地,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表现为集体农场的形式,它在生产领域、生活领域、自我管理领域以及文化领域都支持高度的社区化,但是一旦触碰到经济上的局限性,则会表现出力不从心的一面,实践证明它难以满足个体对自由以及自决的渴求。

尽管如此,20 世纪的三个左翼潮流还是提供了不少正面经验。首先,这些潮流至少在原则上表明了规划社会发展的结构是可能的。特别是就这些规划的中心关注点而言,它不仅能够成功地付诸实施,而且可以迅速地得以实现。在保持公司的独立性与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提高效率与创新能力,这些非但不能被削弱,而且还要被驯服以适应于社会规划,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⑨。其次,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能够成功地将强大的公共合作部门与私有部门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体系和民主参与得到充分发展^⑩。

①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1s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②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Beck, 2011.

③ Jonathan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Princeton, N. J.: W W Norton & Co., 1997.

④ 此处原文为:“the creation of niche structures within the given order(interstitial transformation)”。

⑤ 见 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2010.

⑥ Wolfgang Fritz Haug, “Marxismus”, in Wolfgang Fritz Haug, Frigga Haug, Peter Jehle, Wolfgang Küttler (Hrs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2015, Vol. 8/2, ss. 1844~1877; Georg Fülberth, *Marxismus*. Köln: Papyrossa Verlagsges., 2014.

⑦ 见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⑧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13.

⑨ Klaus Steinitz & Dieter Walter, *Plan-Markt-Demokratie Prognose und Langfristige Planung in der DDR-Schlussfolgerungen für morgen*. Hamburg: VSA, 2014.

⑩ 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混合所有制不但没有在经济方面表现低能的证据,相反它在社会和人道方面突出的优越性却是尽人皆知的^①。这种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可能对价值变化与不断追求个性化与灵活性的趋势做出反应。另外,混合所有制经济还十分依赖一些大的跨国经济集团和经济部门。再次,在以自由合作为原则的前提下,合作规划和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规划探索了各种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些规划不仅展示出它们自身的无穷魅力,也显示出这些方法的巨大潜能。然而,当群体凌驾于成员的个体生活之上时,它们就成了封闭的公社,这些原则就不再适用。

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②。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根基,它激发了反殖民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解放运动,它对西方社会文明的批判启迪了共同体主义规划。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部分地丧失了作为社会分析、左翼实践和全面解放诉求这三者之间的统一性。

三、21 世纪: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及其视角

21 世纪初,人类文明的五个基本维度都出现了断裂,其规模犹如 18 世纪晚期。这次断裂再次引起了自然关系及其技术基础的变迁,并由此引发了各种结构上的变迁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知识结构以及国际结构。这种变迁与全球文明危机紧密相连。这些变迁与全球文明危机紧密相连,它们释放出来的惊人活力,对任何转型策略来说都是一种巨大挑战,这不仅涉及国家和地区层面还涉及国际层面。这些转型策略试图在断裂、稳定、安全、合法与一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未来前景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就此而言,国家与其各个系统之间往往处于一种既要激烈竞争又要高度合作的关系之中。被卷入这些进程的各种角色,无论是公司、社会运动还是市民社会组织都同样遭遇到改变带来的同等的挑战。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彻底地更新,推行必要的方式以克服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中的局限性。这些方式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方面:首先是发展的潜能;其次是驯化资本积累的潜能;再次是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然而,这种更新的实现还必须要面对第四个挑战:克服资本主义文明与美国生活方式的主宰。第五个挑战就是对转型策略的发展。

(一) 发展的潜能

资本主义创新及其提高效率的能力,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这种能力的前提是要消解生产者和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短暂统一,同时将生产要素转化为不计其数的商品,但受利润导向和竞争驱动的公司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见图 1)。资本主义将不断创新作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它创造新的生产条件也只是为了实现资本积累这个目标。对资本主义来说,实现资本积累的初衷从未改变过。它“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③,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正常运行。这个前提就是开放性的权利机制不仅能确保获取资源的多少不受限制,而且还能确保财产受到保护^④。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与知识都被纳入市场中,获得了金钱的形式如工资、租金、利息或者价格。同时,资源几乎可以任意组合,正如 R. M. 马克伊弗尔(MacIver)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表达的:“这个‘撒旦的磨坊’除了追逐利益之外无视人类一切其它需求;这些磨坊开始无情地将社会碾压成原子。”^⑤尽管如此,这种分裂还是具有积极性的一面。首先,正是分裂才使经济因素的重新组合成为可能,这种组合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能力的首要条件,正如熊彼

① Richard Wilkinson &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New York: Penguin, 2009.

② Michael Burawoy. "Marxism after Polanyi", in Michelle Williams, Vishwas Satgar (Hrsg.), *Marxisms in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Critique & Struggle*.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4~52.

③ Karl Marx & Frederick Engel. "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p. 487. 本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30 页。

④ Douglass C. North, Joseph Wallis &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2.

⑤ Robert M. MacIver. "Foreword",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 x.

特(Schumpeter)所分析的那样^①。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保留这种发展能力,以此在转变了的发展模式中保持创新精神和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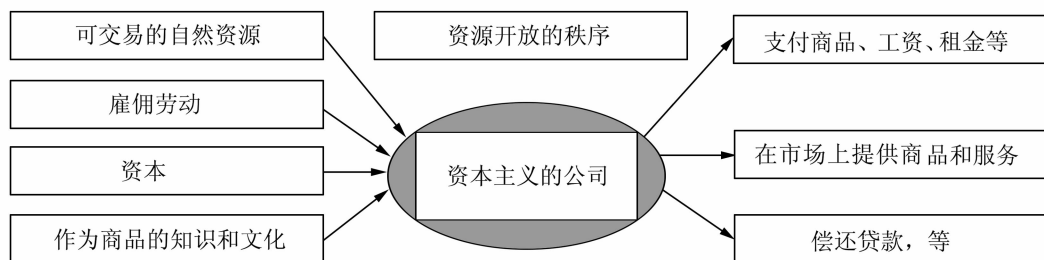


图1 公司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当再生产的主角

(二) 置于资本的主宰之下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表现为冲突的两方面同时共存,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财富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及各种社会角色对资本剥削法则的屈服。资本主义社会“选择”未来的条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协商,也不是来自民主参与,更不受公众的控制,而是源于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资本结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特征就在于它一方面能够将巨大活力、极端未来导向和狭隘地只注重利润增殖的衡量尺度这三者融为一体;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使极大丰富的多样性与财富向利润的残酷简化相伴随。资本主义以过去为基础,毁灭现在,创造利润以期待一个“更加富有的”未来。通过保留资本所有者自由进入市场的权利,资本主义剥夺了工人和社会在自身再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权。

资本主义过剩与不断产生的匮乏并存,“过多”与永恒“不足”并存,其原因就在于永无止境地围绕着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知识而展开掠夺性竞争。各种社会角色都表现出对资本投资和制度化竞争的依赖,但这种依赖本身还是受资本主宰,这使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屈服。资本控制还重塑了所有其它关系——或直接或间接。资本积累的自身逻辑即使不是推动其它关系变化的唯一的原因,也应该是最重要原因——它如今被称作市场的释放^②和金融—市场—驱使的积累^③,或者金融—市场资本主义。一切私人预算和公共预算对资本积累的依赖,是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建立:首先,所有预算的收入都取决于企业的成功,而企业的成功恰好证明了它自身在企业竞争、区域竞争以及民族—国家竞争中的资本运行。其次,无论是由市政当局和地区提供还是由国家提供的个人和家庭的中短期资源供给,都取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社会主义的转型路线就是要克服资本积累的控制,以确保政治的优先性。

(三)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劳动力市场取决于资本主义各部门的成功运行以及它们各自的竞争力水平。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产生了人生的可能性分层,个性化与市场化携手并进。正如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说:“一个人仅仅知道该怎样工作已经远远不够了,他首先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要知道如何去销售他自己。”^④如果个人失去了作为一名“劳动力”的可能性,这将成为持续威胁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而笼罩着他的整个人生。不稳定则成为人生常态^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仍然主宰着公共一个体的生活世界。全球中间阶层的“帝国主义生活模式”^⑥不断发展起来。雇佣劳动的结构性限制“重塑”

① Joseph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Hill Book, 1964.

② Naomi Klein, *Die Schock-Strategie: Der Aufstieg des Katastrophen-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Taschenbuch, 2009.

③ Joachim Bischoff, *Jahrhundertkrise des Kapitalismus: Abstieg in die Depression oder Übergang in eine andere Ökonomie?*, Hamburg: VSA-Verl., 2009; Klaus Kramer, Sebastian Nessel (Hrsg.), *Entfesselte Finanzmärkte Soziologische Analysen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Campus, abrufbar unter: <http://public.eblib.com/EBLPublicView.do?ptilID=948700> (letzter Zugriff: 7. 2. 2014), 2012.

④ Robert Castel, *From Manual Workers to Wage Laborers: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Question*, New Brunswick[u. a.]: Transaction Publications, 2003, p. 451.

⑤ Isabell Lorey, *Regierung der Prekären*, Wien[u. a.]: Turia & Kant, 2012, s. 57.

⑥ Ulrich Brand & Markus Wissen, “Sozial-ökologische Krise und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 Krise und Kontinuität kapitalistischer Naturverhältnisse”, in Alex Demirović, Julia Dück, Florian Becker, Pauline Bader (Hrsg.), *Vielfachkrise: Im finanzmarktdominierten Kapitalismus*, Hamburg: VSA, 2011, ss. 78~93.

或“殖民”了生活世界的韧性(哈贝马斯)。与为工资而工作相对应的是通过消费而获得认可: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知道你存在——这就是“美丽新世界”的箴言^①。

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技术创新不断侵蚀着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走向解体。他们中的有些人努力增加收入,提高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声望地位和社会保障。他们拥有全球紧缺的资格证书,供职于兴盛的德国出口工业的重点部门,或者是高级公务员。而另一些人则为了高一点的薪水和好一点的岗位而奋力拼搏,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价值,因为这种价值不仅关涉到对老人的赡养,还关系到对孩子的养育等方面。然而,还有一群人则被推向了社会的底层,他们失去了资质和价值,工作变得空洞乏味。他们是服务行业的无产阶级,从事着清洁工作、贮存工作或者是运输工作;他们是安保人员,从事着投递工作、货物整理工作或者是在廉价的超市里从事收银工作;他们是服务员,或者是从事着数字化时代最为枯燥的工作。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工作远离人们的视线;他们在“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岗位上彼此隔绝,而且总是轻而易举地被人取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移民。自由与平等已经成为一对极为冲突的概念。

(四) 克服被称为文明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动力的前提条件是:1. 将自然资源标价为可以买卖的原材料;2. 将一部分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3. 创造一个资本市场;4. 将知识和文化作为可以被私人利用的资源。明码标价的自然、领取工薪的劳动力、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商品形式的知识与文化,它们依次与以下四个领域的财富生产相联系——与自然新陈代谢式的交换(盖亚假设的地球有机体领域);个体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生活世界;社会和政治机构以及文化领域。一切都表现为“资本”,它每次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金钱和金融投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视自然为资本,甚至视感情为资本。”^②

构成社会再生产的所有领域都是通过资本来定价的,这将引发四个核心问题(图 2)。在此,我们表述这些问题的立场主要来自那些对排斥、压迫和不平等感受最深的人们。只有当最弱者远离危险、不受压制时,自由自在和不受威胁的生活对于所有人来说才会成为可能,这条真理如今依然适用。这四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后资本主义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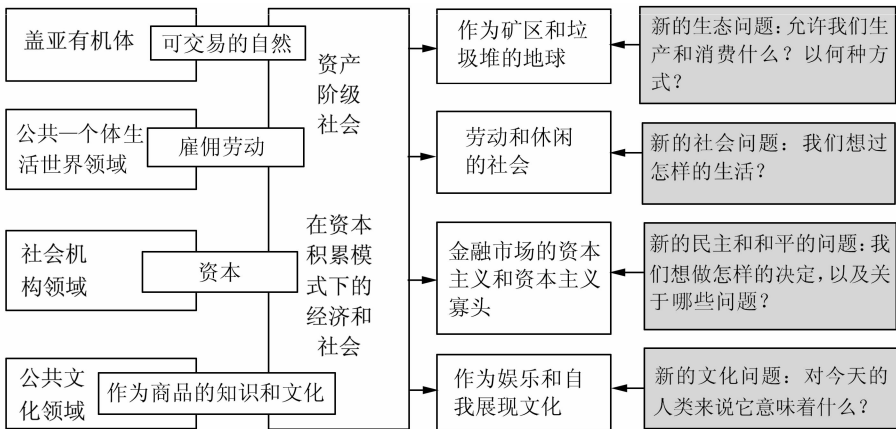


图 2 针对新型文明的四个问题

1. 生态问题:如何才能恢复并持久保障和重建盖亚的可持续性再生产? 这样即使是那些遭受环境毁坏影响最为深重的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享受自由生活最基本的善。

2. 社会问题:我们应如何确保社会中即使是最不幸的群体都能主宰自己的人生? 为此,我们需要在生产、再生产和生活方面做哪些转型?

3. 民主与和平的问题:如何改变社会组织、权力关系与财产关系以及生产和生活模式,以至社会中

^①Aldous Huxley. *Schöne neue Welt: Ein Roman der Zukunf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Taschenbuch, 2012.
^②Elmar Altvater. "Die Wachstumsfrage: Akkumulation versus Moral", in Maria Backhouse, Olaf Gerlach, Stefan Kalmring, Andreas Nowak (Hrsg.). *Die globale Einhegung-Krise: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und Landnahmen im Kapitalismus*.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3, s. 237.

最为弱势的群体都能自由决定自身的生活条件?如何控制国际关系军事化和国内监管扩大化,以至最缺乏防御能力的群体都能自主生活而不受暴力侵犯?

4. 文化问题:我们应该建构怎样的文化公共生活?可以说,即使是那些最为远离的群体,都能在文化上具备自由交流的基本条件并享有智慧—文化的善。

(五) 转型策略

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中国改革^①。中国连续好几代领导人都在寻找上面四个问题的答案,他们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思想^②,最近又提出了中国梦,旨在建设一种新的文明范式^③。20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的最后一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④。但是,随着萨帕塔主义者起义(the Zapatista uprising)、抗议新自由主义秩序以及新的全球化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⑤的出现,对不同文明形态的求索逐渐普遍化。21世纪社会主义潮流已经走向全世界。

然而,筹划一场以不同文明形态为旨归的社会主义转型,其现实性究竟有多大?

第一,转型中的现实政治将会试图去打开这四个维度之间的协同潜能——生态问题、社会问题、民主问题以及文化问题。历史地来看,尤其是当各种运动、冲突和行动变得日趋激烈而各种微小的变化彼此间相互增强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力量以至于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再独自施加压力,这时断裂就发生了。断裂的瞬间往往就发生在这样时刻,“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革新”不断积聚力量而“一些彼此独立发生的进程”却开始走向融合^⑥。这种增援和融合也可以是(当然不仅仅是)有意识的(转型的)政治的结果。无论如何,在这些单个规划被推进的时候,当它们意识到有来自本土和全球不同层次的合适主角的协同和联盟时,这些增援都会起到一定辅助作用。然而,为了建立一种不同形态的文明而开始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型,其现实性究竟有多大?转型期的现实政治试图开启——生态、社会、民主以及文化——这四个问题之间的协同潜能。历史地来看,尤其是当各种运动、冲突和自主性变得日趋激烈,而各种细小的变化彼此增强时,就会产生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再单独产生影响,这时断裂就发生了。断裂的瞬间就发生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革新”不断积聚力量而“一些彼此独立发生的进程”开始走向融合的时候^⑦。这种彼此增援和融合也可以是(当然不仅仅是)有意识的(转型的)政治的结果。不管怎么说,各种单独规划一旦得到合适角色在本土与全球两个层次上的协同与联合时,这种规划就会被推进,因而增援也会被加强。

自然—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对物质—能源财富的使用程度与生活质量之间不再有任何正面的关联,如果条件允许,大多数国家都有望在未来30年至70年内达到同样的水准。我们能够也必须降低数量消费。肆意破坏所有现存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关系,强行将它们置于市场的法则之下,这些早就不是创新的条件了。因此,为了使财富不受损失,我们应该转换关注的重心。反过来说,根据波基特·马恩考夫(Birgit Mahnkopf)的论证,资本主义无视并不断挑战生物—物理极限,资本的这种行为如今已成为“进入新的积累阶段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⑧。这就需要切实可行而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正如艾尔玛·阿尔特维特(Elmar Altvater)那样乐

① Adrian Chan, *Chinese Marxism*. London: Continuum, 2003, p. 180.

② Sujian Guo & Baogang Gou, *China in Search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

③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Dream Infus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New Energy”, in China Copyright and Media, abrufbar unter: <http://chinacopyrightandmedia.wordpress.com/2013/05/06/the-chinese-dream-infuses-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with-new-energy/> (letzter Zugriff: 26. 6. 2014), 2013.

④ Mikhail S.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88.

⑤ Jai Sen & Peter Waterman (Hrsg.) *World Social Forum: Challenging Empires*.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2008.

⑥ Mario Candeias, “‘Wenn das Alte stirbt...’ — Organische Krise bei Antonio Gramsci”, in Michael Brie (Hrsg.), “Wenn das Alte stirbt...”, Die organische Krise des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Zweite Transformationskonferenz der Rosa-Luxemburg-Stiftung, Manuskripte Neue Folge, Berlin, -Luxemburg-Stiftung, 2014, pp. 14~28.

⑦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s. 17.

⑧ Birgit Mahnkopf, “Kapitalistische Akkumulation an den Grenzen des weltökologischen Systems”, in Maria Backhouse, Olaf Gerlach, Stefan Kalmring, Andreas Nowak (Hrsg.), *Die globale Einhegung-Krise: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und Landnahmen im Kapitalismus...*. Münster, Westf./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3, s. 222.

观地陈述:“在创造性智慧的帮助下,现代社会能够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一切挑战。”^①

只有当政治在具体的规划中与生态、社会、民主以及文化这四个方面同步而明确地被展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政治才能令人信服地产生。事实上,所有这些运动都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无论是要求建立免费的本地公共交通系统^②,还是要求低碳能源生产,或是要求监管公共网络的民主化,亦或是要求享有免费的或补贴性的基本电力供应。这些行动能够建立南—北合作机制,形成强有力的全球凝聚力。不管是不是大幅度削减每周的工作时间,同时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或是保障中等工资水平,更新公共就业部门,还是与此类似的社会重建、生态重建以及城市文化重建以及参与预算,这类规划都会变得富有吸引力。

第二,公司章程是用来保障股东价值的,但是它在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危机面前却丧失了原有的权威。这是一个机遇。考虑到公司在私人、公共或者是各种合作形式中的核心性,它们如何在转型时期成为主角就成了问题。只有当它们在再生产自然资源、劳动力、信贷和金融投资时,地球有机系统、公共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民主和自由机构以及文化世界,这些都不再受制于利润和资本积累,同时强化它们自身的自主性,一个有说服力并能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措施才会形成。

公司不断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新要求:好工作、培训、可持续经济、保护消费者、工厂扎根于地方经济、透明度、内部民主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推行公平贸易。这里有两条道路倍受追捧:一条是相关利益群体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另一条是实现企业行为外部和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将管理目标与社会目标以及生态诉求绑定在一起。两条道路都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尝试。

如果不将公司转型为具有经济使命的稳固联盟,那么,全面的社会转型将不可能成功^③。显而易见的是,必须在转型的过程中进行大范围的实验,以实现将追逐利润的公司转型为联盟公司。联盟追求目标的方式不是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是通过提高社会再生产能力,不是以牺牲自然、工作和生活世界、民主机构或者文化为代价,而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协同合作—发展的新形式。

第三,在将追逐利润的公司变为转型时期主角的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使那些形式多样的投资功能社会化。获取资本将会与遵守规则并兼顾社会长远目标紧密相连。降低资本的稀缺性,使其与全面的社会—生态重建水平相协调,“对资本主义累积的压制性力量实施[或多或少平静的, M. B.]安乐死,使其不再开发资本的稀缺价值”^④。与实施资本控制的同时公开问责那些违反准则的公司,使那些反对者的力量逐渐增强。此外,与社会生态重建相关联的“能源民主”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⑤。直接进行公共投资或者参与公司中的公共部门投资,这不仅能使困难迎刃而解,同时还能更好地参与其中。这样,公共部门至少在有损公共利益的决定上具有否决权。从而,无论是在主要的经济结构问题上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上又或是在消费结构的问题上,社会规划都将会获得新的重要性^⑥。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将金融部门转型为服务部门,这样就可以获得统一的经济管理和持续可靠的金融环境^⑦。但首要的前提是大量而彻底地贬值那些过度积累的私人资本,将处于私人体系中的基础公共服务

① Elmar Altvater, “Die Wachstumsfrage: Akkumulation versus Moral”, in Maria Backhouse, Olaf Gerlach, Stefan Kalmring, Andreas Nowak (Hrsg.), *Die globale Einhegung-Krise: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und Landnahmen im Kapitalismus*, s. 229.

② Judith Dellheim, “Free Public and Accessible Transports”, in Mehrling, abrufbar unter: <http://ifg.rosalux.de/2011/07/06/free-public-and-accessible-transport/> (letzter Zugriff: 20. 6. 2013), 2011; Michael Brie, Mario Candeias, “Just Mobility: Postfossil Conversion and Free Public Transport”, in Berlin: Rosa-Luxemburg-Stiftung, abrufbar unter: rosalux.de/fileadmin/rls_uploads/pdfs/Analysen/Analyse_Just_Mobility.pdf, 2012.

③ Heinz-Josef Bontrup, Jörg Huffscheid, Alex Demirović, Michael Schumann, et al. *Wirtschaftsdemokratie: Alternative zum Shareholder-Kapitalismus*, Hamburg: VSA-Verl., 2006; Alex Demirović, “Wirt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Axel Weipert (Hrsg.), *Demokratisierung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Ökonomie, Staat und Demokratie vom 19. Jahrhundert bis heute*, Berlin: Nora, 2014, ss. 37–48; Michael Krätke, “Eine andere Demokratie für eine andere Wirtschaft: Überlegungen zur institutionellen Form der Wirtschaftsdemokratie”, in Axel Weipert (Hrsg.), *Demokratisierung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Ökonomie, Staat und Demokratie vom 19. Jahrhundert bis heute*, Berlin: Nora, 2014, ss. 60–72.

④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Project Gutenberg of Australia eBooks, 2003.

⑤ Tazio Müller, “Von Energiekämpfen, Energiewenden und Energiedemokratie”, in LuXemburg,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linke Praxis*, 2012(1), pp. 6–15.

⑥ Mario Candeias, “‘Wenn das Alte stirbt...’ — Organische Krise bei Antonio Gramsci”, in Michael Brie (Hrsg.), “Wenn das Alte stirbt...” *Die organische Krise des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Zweite Transformationskonferenz der Rosa-Luxemburg-Stiftung, Manuskripte Neue Folge*, Berlin: -Luxemburg-Stiftung, 2014, ss. 14–28.

⑦ Christian Felber, *Die Gemeinwohl-Ökonomie: Eine demokratische Alternative wächst Aktualisierte und erw. Neuaufl.*, Wien: Deuticke, 2012.

再次纳入到统一的公共社会体系之中。第四个条件就是进行转型联盟创新,超越以项目为基础的合作形式,以“马赛克”模式的转型联盟取而代之^①。尽管这么做会很困难,但主角(公司)的部分资源仍将会有意地投资到对合作能力的培养上。对于工薪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来说,似乎唯一可以实现的事情就是:在资本主义已有的框架内,通过工会参与到“危机法团主义(crisis corporatism)”中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这就意味着要根据统治集团制定的规则来进行斗争,但是拥护民主化或者生态重建则会忽视大多数人对社会保障或者好工作的追求,它是分裂的。如果人们在转型的节点上彼此合作,将再分配与重建联系起来,将日常任务与长远规划联系起来,那么反霸权就有可能实现。

第五,也是愈发重要的条件就是共同启动宪法程序,一些拉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模式(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以及委内瑞拉)。这些模式不包括由上而下的压制性规划,而是在公共空间中树立社会主角,并对社会合作的限制性规定做出改变,这是广义的合作,需要特别注意^②。历史地来看,绝大部分动荡总是首先表现为社会宪法的分裂——最近的是 1776 年弗吉尼亚作为英属殖民地发表了《权利宣言》。分裂开始的时候,首先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角宣布当前的社会是陈旧的政体,是过时的社会^③。这就否定了既定宪法秩序的合法性(不仅是它实施的现实性)。其次,一旦在宪法层面宣布革命的例外状态,整个社会的基本法规则不摧自垮。再次,在引进全面的社会讨论后开始组建议会^④,建立合法秩序的新标准,广泛而深入地推进与此相关的社会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个体人权和获取共同的善之间的崭新关系^⑤开始显露。公地化(commoning)和关爱将成为受到宪法保护的非常重要的实践^⑥。宪法程序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规划,它可以推进转型联盟的建构。一方面是资本积累主宰下的经济与社会,另一方面是保障人类文明能够得以保存和扩展,要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代价高昂,但盖亚有机体(gaiasphere)与此不同,它维持人类生存,开发丰富多彩的公共一个体生活世界,建立强有力的民主与和平机构以及能满足各种层次公共一文化需求的自由世界,据此可以断言,21 世纪晚期将不会出现“另一个”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绿色的、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既为我们生活所需的各种公共基础而努力,也为争取人权而斗争的社会,它不仅具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双重根基,同时还以两者的有机联系为特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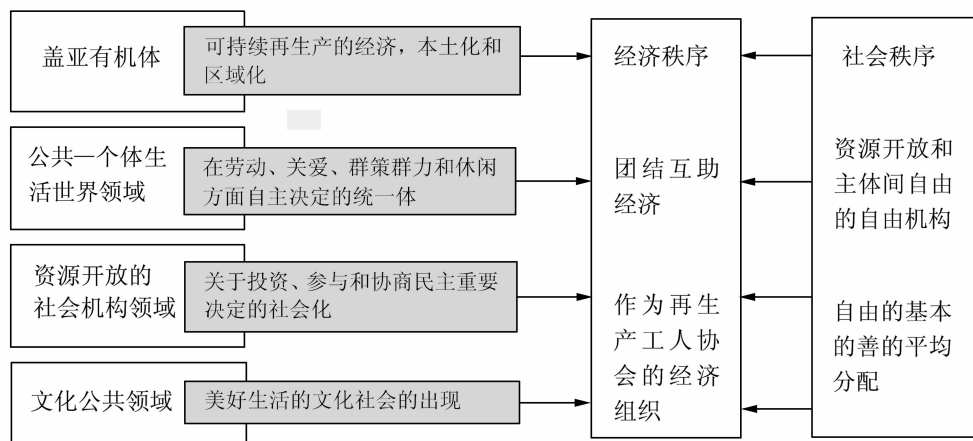


图 3 绿色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

① Hans-Jürgen Urban, “Die Mosaik-Linke: Vom Aufbruch der Gewerkschaften zur Erneuerung der Bewegung”,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2009(5), ss. 71~77.

② Elinor Ostrom,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8.

③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Demokratie! Wofür wir kämpf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3, s. 57.

④ Pierre Bourdieu, *Gegenfeuer*, Konstanz: UVK/Verl.-Ges., 2004.

⑤ Birgit Daiber & Francois Houtart(Hrsg.), “A Post-capitalist Paradigm: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in Brüssel: Büro der Rosa-Luxemburg-Stiftung, abrufbar unter: rosalux.de/fileadmin/rls_uploads/pdfs/sonst_publicationen/common-goood.pdf, 2012.

⑥ 见 Silke Helfrich, Rainer Kuhlen, Wolfgang Sachs, Christian Siefkes, “Gemeingüter Wohlstand durch Teilen”, in Heinrich-Böll-Stiftung, abrufbar unter: www.boell.de/downloads/Gemeinguetter_Report_Commons.pdf Heinrich-Böll-Stiftung, 2010.

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文字中表达了对这种文明维度的期许:“经过一个世纪的盲目‘提升’之后,人类正在修复自己的‘栖居地’”^①。这种修复所打开的视域体现在一系列概念上,如:风景、城市社群(“城邦”)、广场和公共社区点(“集会地”)、家。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激进性。这是一个伟大而极具吸引力的前景,是值得我们体验的生活。正如迪埃特·克莱恩(Dieter Klein)生动描绘的那样,有许多属于明天的东西却持久地跳动在今天^②。一个多姿多彩的团结一致的社会生活再生产,将取代那个在节奏和空间上都受制于资本积累的社会^③。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现代社会能够在“城市体(city of being)”内部这个新基础上结合起来。迎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团结一致的美好社会^④。与卡尔·波兰尼同时代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曾这样说:“真正的创始不是在开始,而是在结尾,只有当社会和存在变得激进,也就是抓住它们的根基时,创始才开始。然而,历史之根就是工作的人类,创造的人类,[我们应该加上关爱的人类——M. B.],是他们在重塑和修整已知的历史。一旦他抓住自己,重建他自己的一切,没有侵占和异化,在真正的民主中,世界上升起了一种可以照进每个人童年的事物,那儿没有人没有:家园。”^⑤中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西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左翼潮流,他们在追寻另一种后资本主义文明时可以发现诸多的相似之处。

Socialism as a Civilizational Project: Rethinking Marxism in the Third Wave of Socialism

Michael Brie (Rosa-Luxemburg-Stiftung)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marked by the first wave of socialism. It was a time during which central ideas were formed, organizations were founded, and movements and uprisings were organized. The second wave of soci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a result of the new imperialist order and world wars, the emergence of anti-colonial, anti-racist, new feminist and emancipatory movements, but also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Russia,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ocial reforms in the centers of world capitalism. The current deep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may result in a third wave of socialism. As with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s of socialism, the third wave demands a deep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Leninism, Maoism, third-world socialism and reformism provided the basis for reflection and spearheaded the second wave of socialism enabling it to expand the range of Marxism into the inner and outer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create new class alliances, transform state and society and attempt to support a new culture. The Marxism of the third wave of socialism will have to go even further. It needs to reflect and support a whole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relations to nature,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and body and spirit. The achievements inside capitalism and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and emancipatory struggles have to be integrated in new path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wave of socialism; Marxism; civilization and crisis

●作者地址: Michael Brie, Rosa-Luxemburg-Stiftung; Franz-Mehring-Platzl, 10243 Berlín, Germany. Email: brie@rosalux.de.

●译者地址: 范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l: minnafan@whu.edu.cn.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4113010205)

●责任编辑: 涂文迁

①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Beacon Paperback e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1, p. 257.

② Dieter Klein, *Das Morgen tant im Heute: 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und überihn hinaus*, Hamburg: VSA, 2013, ss. 169~202.

③ David Harvey,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Heidelberg: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2006.

④ Rolf Reißig, *Gesellschafts-Transformation im 21. Jahrhundert: Ein neues Konzept sozialen Wandels*, Wiesbaden: VS Verl.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9, s. 141.

⑤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Vol. 3,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5, p. 1375.